

· 新论园地 ·

演化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经济政策观*

贾根良 赵 凯

内容提要：“北京共识”的精髓是试验、创新和因时因地制宜的经济政策，它与演化经济学的经济政策观之间存在着惊人的联系，但与“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观截然对立。本文以“北京共识”的政策经验为背景，通过与新自由主义的比较，较为系统地总结了演化经济学经济政策观的六大原理：历史重要与最小限度打乱原理；创造力原理；不确定性与意外原理；复杂与质量型的经济政策主张；系统政策观；试验与政策学习原理。这些原理对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关键词：经济政策原理 新自由主义 演化经济学 “北京共识”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华盛顿共识”突出的特征，它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和拉丁美洲产生了许多灾难性的问题，以至于美国高盛公司资深咨询顾问雷默在2004年5月发表文章，提出要以“北京共识”替代声名狼藉的“华盛顿共识”，并试图对中国经验进行总结。与中国经验具有类似性，东亚奇迹时期的经济政策也与新自由主义具有根本性的不同，是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所无法解释的。

新自由主义明确地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经济政策主张，并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作为其理论基础。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经验和东亚奇迹时期的经济政策却是不系统的，也不是任何现成理论指导的结果，它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人民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然而，正如埃里克·S·赖纳特所指出的，在没有完全理解经济政策所涉及到的各种要素的情况下，也完全有可能暂时实施好的经济政策，这犹如在1929年发现维生素C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地中海的海员就知道用柠檬预防坏血病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方法一样。

但是，作为中国经济学一项重要的发展，现在有必要对这种实践经验在理论上进行探究。我们认为，中国和东亚奇迹的经济政策类型与演化经济学的经济政策原理之间存在着隐蔽的但却深刻的联系。然而，本文并没有对“北京共识”的政策经验进行直接的讨论，这是因为，作为一种再次兴起的经济学范式革命，演化经济学的经济政策原理仍没有得到较为系统的总结，本文则尝试在这方面做出初步的探索，以便理论界能够更深入研究“北京共识”的政策经验。

一、历史重要与最小限度打乱原理

演化经济学凸显了时间对经济社会系统的建设性作用。时间的存在意味着经济变迁是一

作者简介：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凯，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生。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5BJL044)。

种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包含着未来的不确定性与非决定性,而且还包括着过去沉积的历史对未来发展所起到的制约作用,历史是重要的。在任一历史时点上,个体及其所处的环境都是上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它们是其遗传特性和过去经历之产物,是在既定的传统、习俗和物质条件下累积形成的;它们在过程中为下一步提供了出发点……昨天遗留下来的生活习惯以及机械似地残留下来的环境都对今天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强制”(凡勃伦,2004:134)。

经济类型 (economic style) 是历史重要最突出的表现。所谓经济类型就是一个国家在经济演进的历史长河中所保留下来的由主导的经济态度、原则和规范所产生的特定的经济精神,经济秩序中各种各样的规则和其他经济关系以及由技术累积性发展所产生的特定模式 (Ebnner, 2003:154)。经济类型的特定性说明了不同的国家由于相互依赖的不同因素在时间进程中的因果累积而产生的异质性。因此,演化经济学家们主张任何经济问题的分析包括经济政策都应该是情境和脉络特定 (context specific) 的。恰如萨巴蒂尔所指,“政策产出是精英在国家制度的限度内活动并做出的决定,但是这些决定受到公众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而且最终受到历史—地理环境的影响”(萨巴蒂尔,2004:276)。

在经济类型中,人们约定俗成的价值观、思维范式、行为模式、传统类型、风俗习惯等通过政治的作用、古老的传统和绝对的信念维系着权威,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连续性的保障,除非发生“间断均衡”式的革命,否则它根本就不可能被重构。因此,演化经济学家们主张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本国历史遗留的社会规范、文化遗产和传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项经济政策的实施不会引起社会的断裂或规范的缺失等问题。

老制度经济学家福斯特根据以上类似的理由提出了经济政策的最小限度打乱原理。在福斯特看来,所谓制度结构就是由复杂的和相互关联的社会化行为所构成的,其发展具有连续性。制度变迁需要一种新的相互关联的行为模式,需要人们改变惯常的行为模式,因此,人们对新行为模式的理解和适应就必然制约着制度变迁的速度与方向(多普菲,2004:193)。人们愿意使他们的行为适应创新的活动范围取决于人们感到创新是恰当的范围。因此,福斯特认为经济政策必须遵从最小限度打乱原则,即经济政策所包含的新奇内容对制度结构的打破不能大到使整个共同体的社会架构顷刻完全解体。最小限度打乱原理考虑到了制度变迁的适应过程、连续性和渐进性,我国的渐进式改革明显地遵循着这种原理。

历史重要和经济类型的存在强调了历史的累积因果力量,但它却并不意味着“锁定”或政府可以无所作为。所有的政策制定都是由拥有处置权和选择权的人慎重决策的结果,任何已变成惯例化的政治经济制度内容都是从前慎重选择的产物。作为人类创造的产物,在新的情势和新的环境下,它们必然要再次经受人类能动作用的改变。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人们对过去经验的理解与创造性的转变。

二、创造力原理

人类创造力原理是由著名的演化经济学家何梦笔提出来的,他认为演化经济学的核心主题是人类创造力、发明和创新,在与真实的世界打交道的时候,人类创造力、发明和创新是人类学习的基本组成部分,何梦笔将其定义为人类创造力原理(多普菲,2004:97)。人类创造力原理的基本理念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个体既不是“欲望的血球”,也不是机器中的螺丝,他是能动的,恰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

下活动着的”(马克思、恩格斯,1995:72)。

遵循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理念,演化经济学认为人的心智不是一面被动的镜子。“心灵的概念是一种主动的、持续不断的对印象进行组织和再组织的机构”(康芒斯,1997:186)。当情境感知——行为——满意结果这种惯例性的反应程序不能解决人们所面对的问题时,它就召唤着想象、反思和创造性的思维。人的行为是由过去的习惯、当前的情境和对未来的期待所共同决定的,而想象力和创造力则是人的重要特性。决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想象。

能动作用最突出的特征是新奇事物的出现及其扩散。魏特的看法是非常有见地的,“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Witt, 1992: 3)。福斯指出,由多西、纳尔逊、温特和魏特等所发展起来的演化经济学所关注的就是新奇的突现、可能的扩散及其由此所导致的已存结构的转变。在社会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是个体独创性的结果,它源自于个体对社会经济结构及其转变意会性和特异性的知识和技能。

中国改革的成功就在于其潜意识地或不自觉地对人类创造力原理的应用。试验与创新是中国经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陈平指出的,中国的改革一直遵循着试验的方法,并采取了对诸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部门种种渐进的和多样化的制度改革、乡镇企业的“非法竞争”和经济特区的许多非正统改革措施等容忍的态度,这种对异端的容忍抚育了制度建设的创新。中国改革的成功就在于其潜意识地或不自觉地对个体群思维和人类创造力原理的应用,充分发挥个体和地方的积极性,允许多样化的制度试验,实际上就暗含着对个体特异性与创造性的朦胧意识(贾根良,2002:35)。

三、不确定性与意外原理

不确定性是现代经济所表现出的最显著的特性。极度的不确定性也会使政府在试图为其自己的国家找到一条最优解决途径方面显得软弱无力。与演化经济学不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般使用外部性、市场失灵、有限信息、非完全竞争市场等字眼来面对与理论模型相对立的非最优化特性,而政策的目标就是接近所假定的理想模型。田国强指出,“帕累托最优这个概念对任何经济制度都是适用的”(田国强,2005:118),就这样,理论的假设和理想化的乌托邦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经济政策的标准和无法企及的“最优”。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中,“关键是理想化系统成为所有真实系统状态判断的最终参照点,用怀特海的话说就是,一组逻辑抽象变为规范推理,理想化系统从分析工具成为自然的实际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Dosi, 1988: 206)。

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相对立,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政策所面临的环境或政策结果所具有的不确定性是无法排除的。如拉赫曼认为,“时间和无知不仅使经济过程成为必然,而且他们也是这些过程的恰当的性质”(秦海,2004:120)。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来自于环境和政策后果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产生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1)复合效应(composition effect)。“所谓的‘复合效应’,指的是一系列行为组合起来的后果……情况似乎是这样:人人为之,可又无人为之”(吉登斯,1998:71)。经济政策生成了新的互动方式,而其结果取决于大量的非串谋的个体的经济行为的共同结果,如同马克思的“平行四边形”法则一般,无法预测。(2)能力—困难缺口。能力—困难(competence - difficulty)缺口意味着个体决策能力与解决问题的困难之间的差距,不同行为的结果不可知;不知新事物像什么,有什么经济特征;最好的行事方式

是什么,达到目标的有效手段是什么。能力—困难缺口的存在意味着选择的惊喜与懊悔,它的存在本身就会引起不确定性。^③经济政策中的各种行为主体的主观创造力和选择能力对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后果的影响。如哥哈德·韦格纳(Gerhard Wegner)认为演化的经济政策强调政策可能带来的非预设的、负面的效应和市场参与者的创新行为。而我国学者杨瑞龙将人们针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创新性行为总结为层层截留、曲解规则、补充文件、改头换面四种方式。

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演化经济学主张经济政策应该遵循意外原理,所谓的意外原理便是由于经济政策可能会带来与预先的政策目标不一致的意外后果,经济政策制定时需要目标具有模糊性,从而具有容许行为人创造性行为的空间,可以利用不同的行为主体对问题、战略、规则在理解上的不同,进而利用和尊重多样化地方经验,从中获取进一步的经济政策的启示或修正。恰如罗森博格所言:“我们所说的不确定性,是指无法预计求索的结果或预先决定一条通往特定目标最快捷的途径。这种不确定性有一个很重要的暗示:行动不能被计划”(罗森博格,2004:111)。

四、复杂与质量型的经济政策主张

演化经济学认为世界是复杂的,世界是在特定时空中通过多重因素相互交叉、网络式的反馈环路和非线性不可逆过程而形成的,所以从历史重要到强调人的能动作用的创造力原理和意外原理都说明了经济政策既受到来自历史沉积的价值观、思维范式、行为模式、传统类型、风俗习惯的结构性约束作用,又受到来自人类有意识的动机、无意识的意会性知识以及可能的意外结果的综合作用。在这样的前提下,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就不能只是预测,而是“通过对管束和便利人类行动的结构条件进行有见识的转变而达到人类的解放,即在特定时空下,通过结构转变,为社会各阶层提供更大和更平等的发挥创造潜力的机会”(贾根良,2004:42),所以演化经济学提倡如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质量型的经济政策。

演化经济学质量型的经济政策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数量型经济政策,如价格管理、投资或储蓄政策、减税或增税、利息率的调整、货币量的供给等。但是,“正如癌症不能通过输血来治疗一样,许多经济危机也不能通过数量型政策治愈,它必须通过复杂的质量型政策如制度改革或系统转变来解决”(Pelikan,2003:18)。数量上的问题大多都与结构性因素有着诸多因果关系方面的联系,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尤其是中国这样面临着大规模制度变迁问题的国家,更多的是制度和科技创新、结构变革与转换的问题,进而发挥各种行为主体的创造力。

就制度性经济政策而言,演化经济学强调制度之间存在着互补和互动的关系,在历史因素、人的主观性、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条件下,应放弃新自由主义对最优制度或核心制度的追求,并对适应性和多样化的制度性政策进行研究。在制度性经济政策的研究中,哥哈德·韦格纳强调指出,制度性政策是与规则选择有关的经济政策,它可以保障市场参与者在规则内有选择的自由,他还把制度性经济政策分为自上而下的政策和自下而上的政策。斯蒂芬·奥克鲁西(Stefan Okruch)也强调制度性经济政策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制度竞争。而柯武钢和克劳斯·海恩(Klaus Heine)则认为不同辖区之间的制度性竞争政策利用了哈耶克的竞争作为发现过程和熊彼特的竞争是创新与模仿过程的观点,是演化经济政策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演化经济学家何梦笔同样强调了政府之间竞争的作用,并指出中国传统的氏族社会、现代的地方法人主义为这种制度性经济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基础。

由于技术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涉及到的是经济系统本身动态本质的问题,因此,它必然是演化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议题。而演化经济学的企业理论、网络经济和国家创新体系等方面的研究则是“质”的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演化经济学认为企业是惟一能获取和结合各种知识并运用于实践中的组织,因此,与演化的技术创新政策相关的微观政策也主要集中在处于一个演化的技术轨道中企业的能力塑造问题,这包括对创造性破坏过程的适应与抵抗能力、学习能力、自身的创新能力等。但随着经济系统复杂性的增加、劳动分工的深化以及知识所具有的意会性与不可符号化的性质,不同知识之间互补性的增强也就成为必然了。因此,演化的技术创新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协调和促进不同制度、组织(如政府、市场、企业、产业群和学术单位)之间的学习、互动和适应,从而生成并扩散创新,而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可以说就是演化的创新政策的宏观政策。

五、系统政策观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是还原论的,即将与经济问题相互嵌套影响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还原为外部环境和与资源配置有关的外生关系,而资源配置问题则被还原为单纯的市场行为,最后又将市场行为归结为价格问题,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是价格问题,政府的政策就是使价格正确,当然这一点也是建立在完全理性的人性假定上。就算后来对新古典经济学有着重大修正的新制度经济学也同样是市场还原为契约和个人理性。

然而,正如迈尔所言:“极端的分解还原论是失败的,因为它对一个复杂系统的组成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未予重视。一个孤立的组成成分,几乎毫无例外地具有与作为整体一部分的组成部分不相同的特性,当分离后它就不再显示组成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最普遍或许最重要的生命现象中,组成部分是如此地互相依存,一旦与功能整体分离它们便丧失了它自身的特性和意义,实际上也就否定了自身的存在。为了研究复杂组织系统的问题,就必须研究多个相互关联的系统协调整合发挥作用的问题”(迈尔,1990:69)。尽管经济政策一般是针对某些具体问题的,但经济是一个系统,特定的问题必须在与系统的性质、结构和动态等有关的概念体系中加以阐释。因此,经济政策必须与自然环境、国家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中的惯例、非正式制度等协调一致,其基本的理念必须是系统论的。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对社会经济系统重要的是各种因素或子系统之间的非加性、相干性,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例如,演化经济学家梅特卡夫认为,科学技术创新政策应该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着重于保证有效知识生成的支持系统。创新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将科学和技术知识与市场机会和组织机会的知识结合起来(Metcalf, 2003)。而基斯·史密斯则遵循演化和创新经济学的系统论方法,考察了政府干预的基本原理。他从四种“系统性失灵”的角度为政府行动提供了依据:来自于基础设施不充分的基础设施失灵、由于突然和意料之外的变革而导致的转变时期失灵、锁定失灵与社会法律制度的失灵而产生的制度失灵(Metcalf, 2003:372—373)。

而演化经济学对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便是将创新看作是一种交互作用的社会过程,其分析方法是系统论的,所以国家作用的理论根据就是解决系统失效的问题。系统失效主要表现在系统的行为者之间缺乏相互作用、公共部门的基础研究和工业应用性研究不匹配、技术转移机构失常以及企业的信息不足与吸收能力低下等(王春法,2002:69)。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

作用就在于在技术——经济范式更迭的情况下可以提供技术经济机会,提供有效的关联。系统失效的存在恰恰表明政府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六、试验与政策学习原理

演化经济政策主张经济政策的试验性,政府必须要提供制度空间允许并鼓励试验,赋予行为主体以试验的自由。在我们看来,所谓经济政策的试验性质实质上是指不依赖专家的理性设计或领导的个人权威,而是强调多样性的创造活动,并将经济政策看作是一种过程。霍弗和波尔特指出,创新的演化政策需要处理的是多样性、竞争和合作这三种要素之间的“紧张关系”。多样性提供创新并容许不确定性的存在,竞争是创新的动力,合作可以建立基本的联系和互动。为此,政策尤其应该支持和鼓励实验性的行为,比如集中精力把创新和知识作为能力(继而是竞争力)的基础,宽恕可能发生的“错误”并从中学习(Metcalf, 2003: 372—373)。

对经济政策试验性质的强调表明了政策学习的重要性。这种学习包括从多样性中所获得的互动学习、意会性知识的学习以及从失败中总结经验的学习等。就此,演化经济学将政策学习作为核心概念纳入了经济政策分析的框架,恰如凯里所言:“学习不是人类行为的特殊范畴,而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特征”(Atkinson, 1987)。未来的不确定性、非线性作用、复杂与模糊使我们不得不随时间的推移寻求新的政策工具、新的制度安排,因此,学习能力作为创新的基础就显得格外重要。人类没有耐心等待演化的自然发生,更多的经济事件是人工选择的结果,而经济政策制定本身便是一种人工选择,但这种选择是一种不断调适的学习过程。

政策学习的实现机制有两种:自下而上型和自上而下型。政府行为人为从事有目的的行为,并从经验中学习并预测未来选择环境状态。而且,政府可能会主动改进和发展学习路径。政策制定者有改进其绩效的意图,但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仍然需要自下而上机制的补充和修正。

演化经济学家斯蒂恩就为知识经济时代发达国家创新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种“政策学习”的框架。斯蒂恩(Steen, 1999: 72)认为,政府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作用就是促进创新。而要实现这种作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要进行持续的交互学习,其目的就在于帮助政府做出有关创新和技术政策的“制度调适”。这种“制度调适”实质上就是政策制定者“学习”的结果,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种类型政策学习:第一,信息处理。通过获得解决特定问题所需要的信息来实现“制度调适”,它本身并不造成既有认知模式和学习方式的改变。第二,制度借鉴。通过“地方化”引进其他国家和地区成功的制度和政策。制度借鉴一般会导致政策制定者已有视角和认知模式的变化。第三,交互性的知识创造。这是导致新的、前所未有的政策手段得以出现所需要的知识创造形式,它往往会带来新的政策学习方式和新的认知模式的出现。

政策学习概念的提出说明了政府行为的内生性,政府所制定的制度性政策、技术创新政策,其颁布的法律、规范等都是社会系统互动的一部分,政府不断地与经济行为者交互学习,并对经济政策的实施情况做出反应。而对新自由主义而言,政府作用就是使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应对的只是市场失灵,而政府本身则是一个匣子一般的没有生命的机器,没有内在的变迁、适应、成长、创新并塑造未来的能力。

七、结 语

演化经济学的这六项经济政策基本原理并不是彼此相互独立的,而是可以交互解释并从

总体上加以把握的。一项良好的经济政策制定必然要持有系统观和过程观,前者注重的是经济政策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嵌入性,而后者则强调的是时间的建设性作用,包括历史的沉淀、现在的选择、未来的不确定、新奇以及保持变迁的连续性等。在此基础之上,经济政策的演化观必然要坚持最小限度打乱原理、试验性政策学习和质量型经济政策等基本主张。无论是对转型经济和我国改革历程的理论解释,还是就我国和发展中国家未来经济政策的制定而言,与新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经济政策演化观都具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 [英]安东尼·吉登斯,1998:《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美]保罗·A. 萨巴蒂尔主编,2004:《政策过程理论》,彭宗超等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贾根良,2004:《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 贾根良,2002:“批判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比较经济学的新视野”,载张仁德等著:《新比较经济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 [瑞士]库尔特·多普菲主编,2004:《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畴》,贾根良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美]康芒斯,1997:《制度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 [美]E. 迈尔,1990:《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多样化、演化和遗传》,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1995:“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美]森·罗森伯格,2004:《探索黑箱—技术、经济学和历史》,王文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秦海,2004:《制度、演化与路径依赖—制度分析综合的理论尝试》,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索尔斯坦·凡勃伦,2004:“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演化科学?”,《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2)。
- 田国强,2005:“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经济研究》2005(2)。
- 王春法,2002:《国家创新体系与东亚经济增长前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Witt, U., 1992. “Evolution as the Theme of a New Heterodoxy in Economics.” Witt, U. ed. *Explaining Process and Change: Approached to Evolutionary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Giovanni Dosi, ed., 1988.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Publishers.
- John Foster & J. Stanley Metcalfe, 2003. *Frontiers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Edward Elgar.
- Glen W. Atkinson, 1987. “Instrumentalism and Economic Policy: the Quest for Reasonable Value.” *JEI*(3).
- Marianne van der Steen, 1999. *Evolutionary System of Innovation—a Veblenian – oriented Study Into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Factor*. The Netherlands: Van Gorcum.
- Alexander Ebner, 2003. “Understanding Varieties in the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the Concept of Economic style.” In John Groenewegen and Jack Vromen, eds. *Institu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Capitalism: Implication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Edward Elgar.
- J. S. Metcalfe, 2003. “Equilibrium and Evolutionary Foundations of Competition and Technology Policy: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Innovation Process.” In Pavel Pelikan and Gerhard Wegner, eds. *The Evolutionary Analysis of Economic Policy*. Edward Elgar.
- Pavel Pelikan, 2003. “Why Economic Policies Need Comprehensive Evolutionary Analysis.” In Pavel Pelikan and Gerhard Wegner, eds. *The Evolutionary Analysis of Economic Policy*. Edward Elgar.

(责任编辑:刘英)